

于文秀 著

“文化研究” 思潮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人民出版社

“文化研究” 思潮导论

于文秀 著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 园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思潮导论/于文秀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2

ISBN 7-01-003854-6

I. 文… II. 于… III. 文化思潮-研究-西方国家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202 号

“文化研究”思潮导论

“WENHUA YANJIU” SICHAO DAOLUN

于文秀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269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3854-6 定价:22.00 元

作者简介

于文秀，女，1965年出生于吉林省通榆县，1987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9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来曾在《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艺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并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出版著作（合著）四部。承担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曾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黑龙江省教委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提名奖。

内 容 提 要

“文化研究”思潮在20世纪下半叶异军突起，已成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作为跨学科的具有广阔视域的新思潮，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本书主要从反权力话语这一视角切入，确立和阐释了它的主要论题，以期达到从宏观层面对“文化研究”思潮的总体把握。“文化研究”思潮主要的理论基础和话语资源为马克思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它以性别、种族、阶级、性倾向等亚文化视角为出发点，考察和批判人类社会文化的文本与实践构成中的权力性因素和机制。“文化研究”思潮作为反权力话语，主要由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批判、性别政治、知识分子角色重构理论等四个基本论题构成。在这些理论领域，“文化研究”思潮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思想。

责任编辑 田 园
封面设计 曹 春
版式设计 顾杰珍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从马克思哲学到 20 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 演进历程：“文化研究”思潮的知识图谱	(19)
一、马克思哲学的文化内蕴	(22)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	(31)
三、后现代主义	(46)
第二章 “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论基础和话语资源	(70)
一、理论来源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	(71)
二、理论来源之二：后现代主义差异理论	(102)
第三章 反权力话语之一：大众文化理论	(140)
一、对经典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142)
二、“文化研究”学派大众文化理论范式之一： 积极性的 大众文化理论	(167)
三、“文化研究”学派大众文化理论范式之二： 批判性的 大众媒介理论	(193)
第四章 反权力话语之二：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	(210)
一、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发展轨迹与早期经典	(211)
二、“东方主义”理论	(227)
三、后殖民批判辨析	(240)

第五章 反权力话语之三:性别文化政治理论	(258)
一、女性主义早期理论与“文化研究”思潮	(259)
二、颠覆父权制文化:社会性别理论	(274)
三、解构双重话语霸权:他者妇女理论	(290)
第六章 反权力话语之四:知识分子角色重构理论	(323)
一、理论来源之一:现代知识分子理论	(324)
二、理论来源之二:后现代知识分子理论	(337)
三、“文化研究”学派的知识分子观	(353)
结 语 西方理论与本土语境	(372)
主要参考文献	(386)
后 记	(395)



导 言

“文化研究”思潮是目前国际国内的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做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之一。它于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于英国,70—80年代逐渐走红欧美等英语世界,后在全球范围迅猛发展。90年代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被用于中国的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文化研究”所关注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与传统的文化研究试图建构综合性理论不同,它关注的是人类的差异性与多元性,尤为注重弱势文化,研究以往被严格的过细的学科分工所忽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等领域,旨在消解文化文本和文化实践中的各种权力话语,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倡导机会均等、包容差异的多元文化社会。

一、“文化研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奇峰突起、卓尔不群的世纪,因为它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和所创造的物质成果是以往所有世纪的成就难以企及的,同时在这个世纪人类精神和文化所经历的超越、断裂和震荡也是前所未有的,可谓“惊

涛拍岸，卷起千堆雪”。20世纪在历史浩瀚的幕布上投下了自己巨大的身影。

文化是20世纪的一个关键词。这里的文化不是社会学层面的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也并非人类学意义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现象的总称，在这里文化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它已构成人的一种内在的和机理性的存在，即它已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存在的一种精神“逻各斯”，即精神理性。从现代哲学形态可以看出，哲学家们已把哲学的目光从以往传统的视角和问题域拉回到对人的存在本身也就是文化的关注和探求，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根本矛盾更是已聚焦于文化之上，文化越来越具有深层和中心意味，并成为一种哲学化甚至形而上意味的视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才提出：对文化的哲学探求将是未来哲学的一种自觉形态。文化不仅是人的存在的一种深层结构，而且是对人的社会历史的一个根本性的分析和批判视角。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20世纪的文化批判已成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回响，激烈的批判与激进的解构，构成20世纪文化的显性叙事。如果要用更简单的词语来概括20世纪的文化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批判和解构霸权或权力。而这里霸权和权力的内涵是多义性的，它既包括现代性所激烈批判的霸权，同时又包括后现代主义所要解构的霸权，更包括“文化研究”所要抵抗的文化霸权或权力话语。正如著名后殖民理论批评家赛义德（又译为萨义德、萨伊德）所说的：“我们这个世纪的主要知识活动之一就是质疑权威，更遑论削弱权威了……不但对于什么构成客观现实的共识已经消失，而且许多传统的权威……”

大体也被扫除了。”^①

激烈的批判和激进的解构在 20 世纪几乎平分秋色。现代批判理论对工业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和霸权的批判,构成了 20 世纪前半期文化理论的主导行为,而对于现代性宏大叙事和主流文化的解构和抵制,倡导差异与多元、标举少数与边缘,则构成 20 世纪后半叶的主要文化实践。上述 20 世纪的文化活动恰好构成“文化研究”思潮崛起的大背景。

20 世纪前半期,以科学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工业文明展示了惊人的成就,它同时带来了不可否认的积极性内涵,它对人类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提升是以往文明所无法比拟的,但工业文明发展的偏至则导致了技术理性独角戏的上演,成为扼杀和桎梏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的异化和统治力量,也构成文明的困境。这种异化和统治力量对人的存在来说无疑是一种霸权,它以非暴力的形式,通过科学技术来实施对人的统治和压迫,正如现代哲学家们所指出的,本为打破神话与霸权而被推崇的启蒙理性,自身却蜕变为神话与霸权,因此,现代文明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即超越与霸权同在。正是在这种意识上,卢卡奇要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抵抗物化,阿多诺倡导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呼唤培育边缘人与亚文化群体来作为对抗霸权的新主体,哈贝马斯提出建立新的交往理性。从根本上看,上述现代主义批判理论所追求的依然是总体性的话语和宏大的革命的叙事,或依然执著于现实政治层

^① 萨伊德:《论知识分子》,单德兴译,台北麦田出版社 1997 年版(下同),第 130 页。

面的革命,或追求一种宏大的理论,带着救赎与乌托邦的情怀构筑着重建现代性的光荣与梦想。

然而这不乏理想主义与悲情色彩的现代主义的光荣与梦想却没有无限延展,它在 20 世纪中期几乎被拦腰斩断。如果说一定要找出某一年作为标志,那就是 1968 年。

1968 年在西方历史上是不寻常的一年,是颇具纪念碑式意味的一年,它既是一个终结,又是一个开端,因为这一年的“五月风暴”作为一个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意义的象征性事件,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水岭,那张 1968 年 5 月贴在巴黎大学紧锁的房门上的著名海报也许正昭示了一种社会的转型与文化变迁:“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像力正在夺权。”^① 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1968 年所启示的意义是重大的,重得让我们这个时代难以背负。虽然它与历史上其他的革命相比并没有发展出革命性的权力结构翻转,但和它一比,其他的革命都要矮了一截。五月革命所产生的冲击和变革完全是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与哲学“理念”的断裂和转变,^② 正如福柯在后来回顾自己的转变时所指出的:“从 60 年代初期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当然,这不能归因于政党。这是许多社会运动的结果。这些社会运动实际上改变了我们全部生活、我们

① 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法国 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三联书店 2001 年版(下同),第 132 页。

② 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法国 1968:终结的开始》,第 131 页。

的思想、我们的态度以及其他不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思想。”^① 20世纪后半叶,人类文化景观上的重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这些变化都成为“文化研究”思潮的直接的文化背景。

第一,六七十年代,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它致力于解构现代主义的权威、质疑现代性的霸权。在此,我们暂且不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优劣、是非以及它们彼此的内在关联与冲突做出详细的辨析,只想简略指出,与求知求同的现代主义哲学不同,后现代主义标举的是差异哲学,主张“去权威”、“去中心”、“拆结构”,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存在,承认异质之间的平等。

第二,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就是思想家们尤其是后现代思想家们普遍对宏观政治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宏观政治或“革命”话语不免带有极权化色彩),转而投入微观政治和话语层面的实践。作为一种文化理论或人文学科的后现代理论,它主要致力于从微观层次上解构现代社会的霸权,以便把人从制度、结构、实践、话语等微观的政治和压制中解放出来,它把话语和知识领域看做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生成与争夺的重要场所,因此它通过揭示和辨析话语与知识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构成机制来消解以往“知识”、“真理”和“客观性”所包容的主观预设和人为建构性的因素,并进而解构使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第三,与前两者直接相关的、也可以说是由前两者所直接

① Miller,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p. 169. 参见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第211页。

派生的是边缘文化和弱势人群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看,边缘文化与弱势人群的崛起使革命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同性恋等文化与群体已越来越引人注目,它们所发出的反抗之音日益嘹亮,它们所掀起的造反运动也愈演愈烈,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至于 20 世纪中期,产业工人阶级显然已不再是反抗的标准支承者。与此同时,其他群体却上升到革命中心的显要位置。首先是第三世界的农民,最近则有学生、人种与种族的少数人群、妇女、同性恋者、囚犯和环保主义者,他们都合法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声称自己是最受社会压迫、最反对当前社会形式继续延续的群体,因而也就是‘革命性的主体’。”^①

“文化研究”思潮正是在前述 20 世纪大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它既在精神的底蕴方面承袭了现代理论的批判气质,同时又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中心、颠覆霸权的思想主张,从而立足于边缘文化和弱势群体的阵地,质疑主流与中心文化的权力机制,反对文化霸权,进而实现其抵抗各种权力话语的宗旨。除了上述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外,“文化研究”思潮的出现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背景和原因:第一,它是对战后西方国家文化出现的新情势、新趋向、新特点的回应。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现实层面的激烈的政治对抗与较量已大大淡化,主流文化或中心文化与亚文化、边缘文化之间的对抗渐渐浮出水面。直接的生硬政治统治与军事侵略已被隐性的文化渗

^①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下同),第 134 页。

透与文化殖民所代替,等等。上述变化都需要有新的理论和话语做出实际有效的解读与阐释。第二,从前一统天下的精英主义的“新批评”大势已去,由于它具有非语境化的脱离历史的缺陷,早已不适应新的文化形势,它有着深刻的局限与偏见,代表的是一种保守僵化的旧文化标准,因此文化批判呼唤新的理论的出场,以边缘的、批判性的立场为主要标志的“文化研究”适应了新的历史需要,应运而生。第三,出于对学科与专业划分过细、过于刻板的一种反动。已有的传统学科和专业划分得过细已使学科间的界限变得异常僵硬,构成对思想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严重束缚,“文化研究”的崛起正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①。“文化研究”思潮主要在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生活进行文化批判与文化分析,必须采用跨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杰姆逊(又译为詹姆逊)将“文化研究”称为一种“后学科”的代表。

二、“文化研究”概要介绍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而是一个专门术语,它主要是指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兴起,而后扩展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虽然它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400页。

一个学术热点和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但目前“文化研究”还没有一个真正完整而确切的定义,这主要是由于它不像传统或经典意义上的学科那样有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更确切地说,“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反定义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显然,任何给文化研究‘定义’的努力都会顷刻陷入困境之中。并没有一个文化研究主张,无论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总是有多个的、叠合的、变化的投向、所执和矢量,它正是依此来不断地重新阐发。……文化研究总是在断裂和游走中向前推进的,不断地拼力重新安排和重新界定工作平台本身的理论差异,以回应特定的历史问题和事件。”^①尽管难以定义,但“文化研究”也并非无所指,它可以通过以下两点来辨别。首先,它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研究界,以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成立为正式崛起的标志。该中心最早为英文系的一个机构,后来成为了独立的研究机构。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等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先驱。后来“文化研究”作为新的学术思潮进入美国及西欧乃至世界更大的范围。其次,从研究范围和涉及的论题、范畴也可加以辨别,即“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当代文化中的边缘文化、亚文化及少数话语,主要论题有大众文化及传媒研究、种族问题与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身份政治以至文化政策与文化机构等等。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化研究只能部分地通过此类研究旨趣的范围加以识

^①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第70页。

别,因为没有任何图表排列能够硬性地限定文化研究未来的主题。”^①因此,可以说,“文化研究”是具有复数意义的论题的集合或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批判话语”。

“文化研究”思潮领域出现并活跃着众多理论家和研究者。早期(伯明翰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斯图尔特·霍尔。后来随着伯明翰学派影响的扩展,“文化研究”思潮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其他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也得到迅猛发展,而且其视域不断扩大,论题也日益丰富,并逐渐形成了各自关注的中心问题和基本理论框架,其基本论题视域主要有大众文化、种族问题、性别文化政治及知识分子理论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研究”思潮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这些分支理论领域中也出现了各自的理论家和研究者。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鲍德里亚、布尔迪厄和费斯克等,后殖民批判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赛义德、霍米·巴巴等,性别文化政治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为琼·斯科特、S. 弗里德曼、斯皮瓦克、莫汉蒂等等,知识分子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亨利·吉罗、赛义德等。他们活跃在“文化研究”思潮的各种领域,并有着丰富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

尽管“文化研究”如此难以界定和把握,但作为一个新的思潮和学派,它还是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开放性与包容性。

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是“文化研究”的最突出的特征。这个特征在“文化研究”中可以说具有全方位的体现,即在于论

^① 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导言”。

题视域的选择、跨学科的取向、多元不拘的方法。

“文化研究”在论题上是动态的，它的视域立足当代并无限地面向未来，任何将其论题与视域固定化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文化研究”“不能局限于专门实践、特殊文类或通俗消遣”^①，它有着包罗万象和吐故纳新的冲动，正如澳洲“文化研究”学者西蒙·杜林所说的：“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的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② 如果非得需要对“文化研究”的论题和视野做出总体性和同一性概括，那么也许问题意识可以作为一个答案。因为“文化研究”正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来面对现实政治社会的。

“文化研究”在跨学科上更是取向鲜明，它本身不仅是跨学科的学科，而且它有意反学科，因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不仅是跨越现存的学科疆界，而且更迫切的是拆解学科化的知识方式，对学科疆界本身提出质疑”^③。因此，对于“文化研究”来说，“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掌握这种研究的全部复杂性（或严肃性）。文化研究就发展倾向来看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④ 跨学科不仅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

① 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13页。

② S. During,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伦敦：Routledge 出版社 1993 年版，“导言”。

③ 科内尔·韦斯特：《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206页。

④ 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9页。